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11

2009年2月23日

蘇聯解體的挽歌（上） ——兼談“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

黃元¹

2008年3月31日的《香港傳真》上發表了中共中央原組織部長張全景先生的文章——〈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以下簡稱：張文）。筆者認為該文實際上繼承了中國共產黨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觀點。至今已經過了將近50年的時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很多的問題也具備了能夠回過頭來予以重新認識，乃至進行反思的條件與環境。本著這一精神，筆者覺得有必要就張文的諸觀點進行重新審視，並用事實，澄清人們過去的某些看法。

1991年12月2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召開最後一次會議並宣佈解散蘇聯。伴隨著東歐的劇變，由列寧創建的當年世界共產主

¹ 作者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員，現為北京東方旋律文化藝術中心有限公司總經理。

義運動的中心，存續了將近 70 年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解體了。這的確是 20 世紀可數的重大事件之一。當時的中國正忙於改革開放。就在蘇聯解體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要求中國人民專心於經濟建設（發展才是硬道理），擱置姓“社”還是姓“資”的討論。這一講話，使中國義無反顧地走向了市場經濟的道路，形成了中國改革開放鉅大洪流。但也正因如此，對蘇聯解體，蘇共亡黨，中國共產黨當時既未能顧及，而且迄今為止也沒有做出任何官方解釋和結論。

然而，蘇聯的亡黨亡國，對一切曾經與共產主義運動息息相關的人們是不能不考慮的問題。特別是對深受蘇聯的體制，文化影響，與蘇聯有過共同歷史，共同道路的中國人來說，是不能不認真對待的問題。因為這裡有太多的教訓可汲取，又有太多的恩怨需要理清，還有很多情結需要梳理。

張全景先生在他的文章裡，就蘇聯亡黨亡國的原因概括為如下幾條意見：

（1）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篡奪了蘇共領導權，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是黨和人民的叛徒。並借用俄共領袖久加諾夫的話說，蘇共的失敗、蘇聯解體是從赫魯曉夫開始的。他在蘇共 20 大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過 30 多年的滋潤生長，到戈爾巴喬夫時“開花結果”——蘇共失敗，蘇聯解體。

（2）蘇共在理論上背叛了馬列主義，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其代表作就是“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理論。最後導致黨的理念動搖，黨員質量下降。中共 20 世紀 60 年代的“九評”對此已作過評價，並已有定論。

（3）黨內腐敗，到戈爾巴喬夫時代已經病入膏肓。黨的領導人嚴重脫離群眾。

張文用這種我國 20 世紀 60 年代語境的，“九評”式的語言告訴我們，蘇共的亡黨亡國是一個歷時 35 年背叛馬列主義的過程，它始於 1956 年蘇共 20 大對斯大林的批判，完成於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的解體。列寧、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蘇聯最後被背叛者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人葬送了。張全景先生的看法，應該說是代表了深受“九評”影響的整整一代人對這一段歷史的認識。

為了弄清蘇聯亡黨亡國的原因，筆者認為首先要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即：（1）斯大林的是非功過，也就是說他所代表的制度是否就是列寧所期望的制度，他本人是否是列寧主義者，抑或相反；（2）對赫魯曉夫改革的評價；他對斯大林的批判是否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其改革是不是蘇聯社會的共同要求；（3）對中蘇關係，特別是中蘇論爭的認識。即中國共產黨於 20 世紀 60 年代對赫魯曉夫的批判是否成立；“九評”到底是一個以什麼為目的的文件；（4）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其改革的失敗是因為背叛，還是因為無能；（5）蘇共亡黨之後蘇聯解體是否必然。弄清楚了以上四個問題，對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歷史評價便可呼之欲出了。

一、關於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

其實列寧生前對斯大林已經做出了評價，而且當時是以致黨代表大會的信件的形式向全黨公佈的，所以也應該將其視為列寧對斯大林所做出的正式評價。現在看來這一評價還是比較準確的。

1922 年底到 1923 年初，列寧分四次口述了四封名為“給代表大會的信”，² 也就是列寧寫給聯共（布）12 大的，通常被稱之為“列寧的政治遺囑”的信件。在這四封信裡，列寧首先建議，

² 中譯文詳見《列寧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第 615~620 頁。

將中央委員會的人數增加到幾十人到一百人。目的是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衝突對全黨的前途產生過分大的影響”。換言之，列寧預見到了他去世之後，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寡頭之間會出現分裂。而由於中央委員會人數過少（註：當時中央委員會只有19人），一旦出現分裂，結果將是災難性的。擴大中央委員會的人數，等於稀釋政治寡頭的影響，而有助於民主決策和黨的穩定（註：關於“寡頭政治”，列寧於早些時候的1920年3月曾說道：“由大會選舉的19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組織日常工作的則是更小的集體，即由中央全會選出的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各有五名中央委員組成。這樣一來就成為地道的‘寡頭政治了’”。³）在這些信件的後半部分，列寧簡要地評價了他的幾位同事，即：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斯大林。在談及斯大林時，列寧寫道：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總書記……。

從這些信中可以充分看出，列寧臨逝世之前首先擔心的是黨的分裂，特別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的最具有危險性的分裂。在面對這一分裂的危險時，列寧又是明確地要求將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撤換下來。對托洛茨基則只是評價他“過於自負”，也就是說，斯大林的危險性要遠大於托洛茨基。很可惜列寧的這些要求，由於斯大林的精明和其他領導人的遲鈍，乃至私心，並未能貫徹下去。列寧的擔憂最後不幸而言中。但從中也還是可以看到列寧確實具有別人所不具備的，領袖人物所獨有的政治敏感

³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7頁。

性。而正是因為包括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在內的其他政治領導人不具備這種政治素質，所以最終他們不但沒能成為列寧之後的領袖人物，反而全體無一例外地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雖然列寧指出“總書記”是一個“掌握無限權力”的職位。但當時的“總書記”較之後來，還談不上真正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傳統上，中央書記就是一個中央秘書的職務。而實際上俄文中“書記”和“秘書”本來就是同一個詞。俄國二月革命之前，聯共（布）的前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沒有設過主席、或總書記的職務。當時的中央委員會秘書，即“書記”是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她的工作範圍是：聯絡通訊、收發來往文件、負責黨的財務和黨費、以及為來訪的同志辦理假護照等事宜。二月革命之後有了一位正式的書記，由一位老資格的女共產黨員斯塔索娃擔任。她的工作內容仍然是事務性的。1918年3月聯共七大之後成立了書記處，由斯維爾德洛夫總負責。這也就是後來“總書記”的雛形。此時的書記處除了仍然負責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之外，還開始監管組織工作。這也是書記處涉足權力的開始。十月革命之後由於需要處理的事務越來越多，1919年3月，在聯共八大上又成立了兩個常設機構，即：政治局和組織局。加上原有的書記處，聯共中央有了三個各負其責的機構。書記處原有的組織工作，改由組織局負責。屆時斯大林同時進入政治局和組織局，並成了組織局的領導人。開始了他走向“掌握無限權力”的歷程。在1920年4月召開的聯共九大上，加米涅夫動議：“組織局有權無需經過政治局批准決定有關組織方面的問題，以及有關不高於省一級幹部的任職調動問題。”這一動議獲得通過後，斯大林實際上獲取了不受政治局干涉而任命州委書記的大權。加米涅夫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這一動議，實際上成為了其自掘墳墓的開始。聯共十大之後，斯大林開始兼管“書記處”。1922年4月召開的聯共11大上，斯大林不僅進入了“政治局”、“組織局”

並正式成為了書記處的“總書記”。這一時刻，標誌著斯大林已經開始掌握幾乎不受監督、制約的“絕對權力”，雖然這時斯大林在黨內還不算是一個突出的人物。但一向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列寧，開始對這位“總書記”，進而也對黨的前途感到不安和憂慮。遺憾的是，雖然列寧仍然享有極高的聲望，但從 1921 年 12 月底列寧的健康開始急劇惡化，在最後的兩年的時間裡，已經無法正常工作。黨內的各位主要領導人也開始各自設計“後列寧時代”的到來。列寧對局勢的掌控能力大為下降。此時，他能夠做的，就是趁自己的影響力還在，上書黨代會，建議採取措施，擴大中央委員會的規模，以及撤換斯大林。奇怪的是，這個被稱之為“列寧政治遺囑”的信件不僅沒有在聯共 12 次黨代會上公開，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寧去世之後的聯共 13 次黨代會上也沒有正式宣讀，只是在各代表團內部傳閱了一下。13 次公佈的決議和大會文件中也絲毫未提及剛剛去世領袖的這一重要文件，也就是說這一文件沒有引起列寧之後領導集體的絲毫的重視。斯大林仍然當選為“總書記”，只是象徵性地表示了一下要注意改掉自己粗暴的毛病。

在此後的年月裡，特別是在斯大林肅反之後，“列寧的政治遺囑”被宣佈為“偽造品”和“反革命文件”。有趣的是，直至最近筆者訪談一些諸如“三農問題”的專家時，有些人迄今還認為“列寧遺囑”是赫魯曉夫等人的偽造。筆者當時反駁說：這個文件明文載於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正式出版的“列寧全集”的第 36 卷，怎麼可以說是偽造的呢？即便是這樣，專家中仍然有人表示難以置信。

其實列寧在設計社會主義的新型社會制度時，從來沒有打算建立一個將無限權力集中到領導人手中的模式。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四月提綱》及其他著作中所設計的政治體制，應該主要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 (1) 官員直接的民主選舉；

- (2) 官員的薪金不得高於一般工人的工資水平；
- (3) 取消國家任命一切地方官員的制度，實行地方自治；
- (4) 軍隊民主化，由選舉產生指揮員；
- (5) 廢除常備軍。建立一個正在消亡的國家，即：半國家；

由於戰爭、國外勢力的干涉等現實原因，也由於嚴酷鬥爭的需要，列寧採取了一些極端的強硬手段，首當其衝的就是放棄了選舉制，而改用任命制。這些美好的設想或是成為了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或是還沒來得及實施、實驗列寧就一病不起了。儘管如此，直至列寧逝世，雖然在國家制度的層面上一直沒能實行民主政治，但在黨內，基本上還是維持了正常的民主生活。

列寧是一位革命家，他的身上也有一定的理想主義成分。其基本思想直接或間接植根於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此前的歐洲人文主義的傳統。他喜歡貝多芬的音樂，更受 19 世紀俄羅斯民粹黨人思想的影響。列寧的哥哥就是一位為反對沙皇制度而獻身的民粹主義革命家。正因為如此，他為之奮鬥的理想是：建立一個半國家的社會制度，即：官員由選舉產生，為選民負責，為人民服務，隨時可以撤換。雖然在十月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馬上面臨的叛亂、內戰和饑荒，使聯共不得不實行高度集權的應急體制，由直接委任制代替選舉制，但列寧一直將委任制視之為“戰時共產主義”的臨時體制。

1920 年，國內戰爭基本結束，列寧和新蘇維埃政府面臨的是一個經濟崩潰的局面。內戰帶來的結果是：1921 年初大工業產量僅及戰前的五分之一，燃料、冶金、機器製造業完全被破壞，農產品為戰前的 60%，棉織品產量為 20 分之一。蘇維埃俄國有 22 個省發生饑荒，三千多萬居民遭到饑荒的襲擊。⁴ 為了儘快恢復經濟，在列寧的提議下，1921 年 3 月聯共（布）十大上通過了“以糧食稅代替餘糧徵集制”的歷史性決議，允許稅後餘糧的自由買賣，在貿易中

⁴ 吉林大學蘇聯研究中心：《蘇聯史大事記》，吉林大學出版社 1983 年，第 227 頁。

允許私人資本的存在等。從而開始了由臨時應急的“戰時共產主義”向較為寬鬆的，也是較為常態的制度——“新經濟政策”的過渡。內戰之後、列寧以新經濟政策為切入點，即從經濟領域入手逐步結束“戰時共產主義”，試圖哪怕是部分地開始建設他所憧憬的半國家的社會制度。然而這一天國般的美麗國度並沒有出現。此後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列寧去世。1927年之後，新經濟政策逐步被斯大林所推行的強制農業集體化和高速工業化的政策所取代。有關民選官員和政府，地方自治和廢除任命制的話題徹底被擱置。黨內的政治生活則相應由寡頭政治向個人獨裁過渡。以後直至蘇聯解體，大廈將傾，獨裁和寡頭政治交相變換，但列寧的這些思想和原則，卻再也沒有被公開提及，而任命制在蘇聯則頑固地統治了70餘年，甚至在蘇聯解體之後的今天，也仍然起著一定的作用。

斯大林是總書記，是直接受益於任命制的黨務官僚，也正是憑藉了幾乎不受監督的任命制依次打倒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李可夫三大反對派的政治寡頭，從1929年起，真正地建立起了一個以斯大林為核心的，“掌握了無限權力”的，不受任何制約和監督的個人獨裁制度。伴隨這一制度的則是鋪天蓋地的個人崇拜和對領袖的神化。對這樣一套制度，我們中國人其實並不陌生。

早在1918年，就在列寧剛剛發動十月革命並奪取了政權之後，同是社會主義革命家，德國女共產黨人羅莎莉·盧森堡就提醒列寧說：“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換，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動因素。”當然，就是獨裁，乃至個人獨裁的政治，也有開明和殘暴之分。但斯大林憑藉任命制所造就的官僚機構，卻真正把這一制度推向了極致。1936和1938年，已經掌握了無限權力的斯大林連續組織了對被稱之為“列寧的老近衛軍”、“列寧老戰友”的兩次大審判。列寧時代的除斯

大林之外的所有當時在世的主要黨政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皮達可夫，拉迪克，托姆斯基等悉數遭到槍決。托洛茨基則被缺席宣判死刑，於 1941 年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去的內務部特工，一個名為麥爾卡捷爾的人所殺害。1937 年，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內戰時期的功臣——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判死刑。隨後五名元帥中另外兩名：曾任孫中山軍事顧問的布留赫爾元帥未經審判即被槍決，紅軍總參謀長葉戈羅夫元帥則死於獄中。一般認為，蘇聯 20 世紀 30 年代肅反（又稱：大清洗）的時間是 1935~1940 年，而 1937~1938 年間肅反則達到高潮，猶如脫韁的野馬，達到了駭人聽聞的規模，並且也已經不限於參加過反對派或曾經和其他領導人關係密切的黨員，大批斯大林的支持者，乃至斯大林本人的親信、親屬也被捲了進去。根據 1956 年 2 月 9 日提交給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長達 70 頁的報告（一般稱之為：〈波斯佩羅夫委員會報告〉）披露，肅反期間，在聯共 17 大（也就是確認斯大林領袖地位的，被斯大林稱之為“勝利者的大會”）上選出的 139 名中央委員中有 98 人，即 70.5% 遭到逮捕並無一例外地被槍決。參加該會的 1966 名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代表中，有 1108 人，即 56.4% 被逮捕，其中 848 人遭到槍決。“在絕大多數共和國，邊疆區和州，黨和蘇維埃機關的領導人幾乎全部遭到了逮捕”。⁵ 蘇聯紅軍的情況更為嚴重。據蘇聯歷史學家麥德維傑夫在《讓歷史來審判》一書中公佈的資料，蘇聯紅軍的五位元帥中有三人，四名一級指揮員中有三人，12 名二級集團軍軍長中 12 人（即，全部），67 名軍團長中有 60 人，199 名師長中有 136 人，397 名旅長中有 221 人，二名一級海軍最高指揮員中有二人，二名二級最高海軍指揮員中有二人，六名一級海軍指揮員中有六人，

⁵ 關於〈波斯佩羅夫委員會報告〉見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新華出版社 2007 年，第 151~152 頁。

15 名二級海軍指揮員中有九人，二名一級軍政治委員中有二人，15 名二級軍政治委員中有 15 人，28 名集團軍政治委員中有 25 人，97 名師政治委員中有 79 人，36 名旅政治委員中有 35 人，不是被槍決就是遭到逮捕。通過這次肅反，蘇聯紅軍的高層指揮系統幾乎蕩然無存，也從未有任任何一個戰役使紅軍受過如此嚴重的損失。無怪乎希特勒當時認為蘇聯的戰鬥力已經不值一提，因為他認為：“蘇聯高級軍事幹部中最優秀部分已於 1937 年被斯大林消滅了”。這次肅反不只是涉及到了黨政軍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機構，也涉及到了全國的各個領域，諸如：工會，共青團，內務部門，公檢法，科技界，文化界，人民團體，乃至外國共產黨在蘇聯的領導人，活動家和革命家。列寧的工作團隊，和列寧關係密切的老黨員，也幾乎全軍覆沒。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曾為這些老黨員奔走呼號，而全無結果。根據斯大林女兒斯維特蘭娜·阿里露耶娃的回憶，她的母系親屬也幾乎全被送進了監獄。1956 年 2 月〈波斯佩羅夫委員會報告〉述及，1935~1940 年大肅反期間，被控從事反蘇活動而遭到逮捕的蘇聯公民總數為：1920635，其中被槍決的人數為：688503 人，與張文所提及的“實際被殺人數 61.8 萬人”比較接近。應該指出的是，張文所提及的數字是 1937~1938 年間的被殺人數。遺憾的是張文並沒有提及期間將近兩百萬人被捕的數字。這兩百萬人可不是一般的平頭百姓，他們不是身經百戰的領導幹部，就是知識界的精英。68.8 萬人的生命更不是一個小數字，正如原蘇共中央宣傳部長雅可夫列夫所言：“斯大林殺死的共產黨人比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獨裁者殺死的加起來還要多”。（註：張文談及這 60 多萬人中確有該殺之人，而且迄今也沒有得到平反。筆者不知道這些該死的人具體指的是誰。也沒聽說蘇聯時代有誰沒得到平反。還望張先生賜教。）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兩百萬人被捕和 68.8 萬人被槍決的數字只是發生在大肅反年代的受害人數。由於蘇聯官方從未公佈過受害人的準確數字，一般估計在整個

斯大林時代被關押和槍決的總數約在 1200~1300 萬之間。赫魯曉夫曾形象地將這次肅反稱之為“絞肉機”。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認為，這些犯人加上他們的妻子、兒女、親屬、至交等受到程度不同的影響者在三千萬人左右，是當時蘇聯人口的近 12%。而且，這還只是肅反的受害人數，尚未計算在此之前的農業集體化中，以及在對車臣，印古什，伏爾加河的日耳曼人等民族滅絕式的流放行動中的死亡和受害人的規模。這是一次政變，還是一次以極其血腥手段發動的一場政變。其目的就是要徹底消滅列寧所創建的革命黨，代之以一個由斯大林領導的，以官僚集團利益為根本目的的黨。以數百萬囚徒的生命為代價，斯大林創建了一個與列寧的理想截然相反的，起碼的人權、民主與法制蕩然無存的，在蘇聯歷史上最為恐怖的個人獨裁的社會。張全景先生如此推崇斯大林時代，不知他本人是否真的願意生活在這樣一種氛圍的社會裡。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發動了對蘇戰爭。蘇聯舉全國之力抵抗德國法西斯，肅反也因此而大有收斂。戰爭給蘇聯人民帶來了鉅大的災難，有兩千多萬蘇聯人死於戰爭。然而另一方面，戰爭同時也打開了蘇聯人的眼界。隨著蘇聯軍隊越過蘇聯國境，大量的蘇軍指戰員親眼目睹了東歐和中歐許多國家遠遠高於蘇聯人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和諧。人們發現，一貫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蘇維埃祖國，和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很多地方其實技不如人。而且見到這一事實的並非少數幾個偶爾到訪的政府官員，而是近四百萬的蘇聯軍人。對斯大林及其蘇聯的正確性和權威性的任何疑問，都是不能容忍的。1948 年，斯大林發動了旨在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為目的的，當時稱之為“反世界主義”的新一輪肅反運動。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普羅柯菲耶夫，以及詩人阿赫瑪托娃首先受到批判。米丘林和李森科的生物學理論被奉為蘇聯科學的頂峰，而西方的摩爾根為代表的遺傳學理論則被斥之為“反蘇的偽科學”。斯大林喜歡以制造反革命集團和

殺人來解決問題。他把思想界出現的所有問題歸結為帝國主義間諜，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和“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所派間諜的破壞。1949年，時任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政治局委員沃茲涅先斯基，列寧格勒黨政首腦庫茲涅佐夫被解除一切職務（史稱“列寧格勒案件”），1950年被控為“叛國罪”被捕並被處決（後被平反恢復名譽）。與此同時，俄羅斯歷史上最為落後和殘忍的“反猶太主義”思潮在斯大林的鼓動下也開始抬頭。赫魯曉夫回憶錄中提到：“他（斯大林）品性中這一主要缺點——對於猶太民族的敵視態度，是不能得到寬恕的”。⁶ 1949年初，官方公佈了“猶太復國主義案件”。“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負責人、中央委員、工會國際前主席洛佐夫斯基，莫斯科猶太劇院院長、著名演員米赫伊爾斯，時任蘇聯第二把手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莫洛托娃（中央委員、漁業部長），以及安德列耶夫的妻子、加里寧的遺孀等也都因他們是猶太人而遭到逮捕。斯大林認為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策劃針對蘇聯的陰謀，從而導致了一場大規模迫害猶太人的浪潮。其後，洛佐夫斯基和米赫伊爾斯被槍斃，莫洛托夫的夫人被流放了整整四年，人們都認為她已經死了。斯大林去世後，莫洛托夫夫人才得以從哈薩克斯坦流放地回到莫斯科。“猶太復國主義案件”使得連斯大林周邊的人們都開始感到人人自危。在斯大林晚年，法制崩潰到連正常的政治局會議也被取消了，代之以斯大林別墅內的晚宴。受到邀請的人基本上是猶如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貝利亞等第二代領導人。斯大林的老近衛軍：卡岡諾維奇（猶太人）、莫洛托夫（其妻子被逮捕）、米高揚、伏羅希洛夫等幾乎完全失去了參加這類晚宴的資格。莫洛托夫開始被懷疑為美國間諜，伏羅希洛夫為英國間諜。斯大林甚至對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封鎖舉辦晚宴的消息。對貝

⁶ 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375頁。

利亞，斯大林則感到恐懼。因為他掌握了太大的權力，實際上成為斯大林非除不可的人物。1953年1月，負責中央領導人保健的克林姆林宮的猶太醫生們被逮捕，並被指控害死了日丹諾夫，還準備謀害斯大林等人。這一被稱之為“醫生謀殺案”的事件正式揭開了斯大林又一次大肅反、大清洗的序幕，其目標就是他的那些“老戰友”。但正如黑格爾所雲：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但如果第一次是以悲劇結尾，第二次則往往以喜劇結束。斯大林這次沒有來得及發動新一輪的清洗，卻在不到兩個月後的3月5日便撒手人寰了。所有的聯共中央主席團（即聯共19大之後的政治局）委員們，也包括所有的蘇聯人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委員們至少可以保住腦袋了。有人說斯大林是被人害死的。而當時能夠害死斯大林的人只有貝利亞一人。當然這種猜測是永遠不會有結論的。但筆者認為，這種謀殺也不是沒有可能。畢竟是性命攸關的大事。有人不願坐以待斃，進而鋌而走險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我們中國，對斯大林的評價基本定格於毛澤東主席所認定的“三七開”，即三分缺點七分成績。總體評價是：斯大林是列寧的學生和繼承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三七開”不是一個嚴密的界定，有很大的隨意性，視情況可增損自便。但總的意思是清楚的，即斯大林的功勞是主要的。“三七開”的評價也是一個總體評價，其中既包括了建立斯大林式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功過是非，也包括了那些並不一定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搭上界的功勞，如高速工業化和贏得二戰勝利等因素。筆者並不想否定斯大林的功績，也不打算就三七開，還是四六開等綜合評價的問題展開討論，只是想就斯大林是否是列寧的學生，以及是否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問題敘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將斯大林稱之為列寧的學生和繼承人恐怕不妥。如前所述，列寧最後的政治遺囑中就明確提出要將斯大林從“掌握無限權力”的總書記位置上調開。而在列寧逝世前的最後兩年裡，

列寧和斯大林的關係已經相當惡化，而且到了幾乎決裂的地步。1922年9月，列寧和斯大林就“民族自決”問題產生了意見對立。1922年9月27日，1922年底（列寧《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一文）和1923年3月5日，列寧三次嚴厲地批評了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1923年1月29日開始，斯大林藉口列寧有病拒絕向列寧提供有關文件，並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有意將列寧隔離於政治生活之外。到了1923年3月，兩人的關係最後到了幾乎破裂的地步。由於斯大林不給列寧提供文件並為此“謾罵和威脅”了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列寧於3月5日和6日寫給斯大林和穆迪瓦尼的信中要求斯大林向他道歉，否則就“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聯繫到“列寧的政治遺囑”，列寧在其最後歲月，對斯大林的粗暴、獨斷專行乃至野心是有一定的警覺，並努力採取了一些措施是顯而易見的。遺憾的是，到了1923年，也就是列寧生命的最後一年，列寧事實上已經被置於只有“接受既成事實”的地位，因而他的這些要求，幾乎未被理睬。

當然，列寧直至去世還是把斯大林視為同志和共產黨人，但也從未將斯大林視為自己的繼承人或學生。列寧主義真正的繼承人應該是布哈林。也就是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稱之為：“黨的最可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應當被認為是全黨最喜歡的人物”。而正是這位布哈林連同他的思想，最後卻被斯大林送上了刑場。當然，列寧在他的遺囑中也提到布哈林“從來不完全瞭解辯證法”，看來這也正是他後來敗給斯大林的重要原因。但，在當時尚存於世的主要領導人中，無疑布哈林의思想和列寧是最為接近的。即，從對“帝國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認識和定義等，兩人的看法均非常相似。由於篇幅的原因，此處對該問題不予展開討論。

至於斯大林是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似乎更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說在列寧的眼中連布哈林都是“從來不完全瞭解辯證法”，而托洛茨基身上則有“非布爾什維主義”的東西，那麼

斯大林身上恐怕就沒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了。青少年時代，斯大林上的是神學校，受的是東正教的神學教育，晚年他討厭猶太人和對待猶太人的態度，恐怕與他早年的這種神學教育有關。可以說，斯大林幾乎沒有受到像樣的、現代意義上的教育。據他本人講，嗜酒的毛病是在流放地，因為無所事事而沾染上的。⁷ 大概因為流放地的環境惡劣和閉塞，客觀條件也沒允許他在年輕時代，深研那些詰屈聱牙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是一位與列寧、布哈林和其他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領袖相比文化水平不高，從實踐中走出來的領導人，理論素養應該是他的軟肋。馬克思主義，包括後來的列寧主義，都是非常複雜的思想。當然不是所有讀懂了馬列主義的人就能擔當這一運動的領袖（中國的王明應該是這種人物的實例），但不懂馬列主義精髓的人則肯定當不了它的領袖。這種人，如果做些具體工作，往往會成為一個傑出的領導，但作為領袖人物，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離我們不很遠的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等都是這類人物的典型。反觀斯大林的一生，自從他開始“掌握無限的權力”以來，他帶領蘇聯這個國家高速完成了工業化的建設，領導蘇聯人民戰勝了德國法西斯，但從未在制度建設上向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設想、嚮往的，即高度民主和法制的道路邁出過哪怕是小小的一步。相反，他以幾百萬人的生命和幸福為代價，建立了一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想也不敢想的、法治與民主蕩然無存的、恐怖主義的個人獨裁政權。這樣的政治制度如果也算是馬列主義的話，那麼馬列主義的失敗，就一定是必然了。筆者曾經閱讀過大量的馬列原著，因而絕不相信斯大林主義與馬列主義有什麼共同之處。

不可否認，斯大林帶領蘇聯人民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工業化的建設。這一歷史過程應該說是反映了蘇聯人民，或曰蘇聯的主體

⁷ 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第432頁。

民族俄羅斯人和其他諸民族的共同願望和選擇。但這一過程原本就是歷史的一環，特別是很多經濟不發達民族的民族意識的體現，並非是馬列主義的專利。19 世紀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德國，20 世紀下半葉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均在其地域內完成了從落後向發達經濟國家（地區）的過渡。特別是韓國，在這一過程中還大量使用了國家幹預的手段。我們不能因此說這些地區成功的經濟建設是馬列主義功績。處於 20 世紀 30 年代，任何一位俄羅斯的統治者，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對舊有的俄羅斯經濟進行改造。至於哪種手段的代價和成本更高，也就是更為合理，則已早在 20 年代，甚至在列寧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進行過大鳴大放辯論。在此不作具體探討。

同理，帶領蘇聯人民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功績，與馬列主義也似乎沒有必然的聯繫。俄羅斯歷史上有過很多著名的統帥，如：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庫圖佐夫、蘇沃洛夫。他們都不是馬列主義者，但都成功地抗擊了外族的入侵。

至於說到斯大林的簡樸，這似乎也說明不了什麼。當然簡樸比奢侈要好。但希特勒也不是一個奢侈的人，也可以稱之為簡樸。但這一美德並沒有阻止他屠殺了三百多萬猶太人以及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況且，斯大林較之周恩來也不算簡樸。他每天晚宴的餐桌上，擺的全是當年蘇聯最上等的美酒和佳餚，遠不是一般蘇聯人所能享用的。加上佈滿全蘇各地的斯大林別墅，度假的費用，也就是說，除去必要的安全保衛、交通、通訊等開支，僅斯大林的個人花費也高於一般蘇聯人不知幾十倍。

那麼如何評價斯大林的功過是非呢？其實這也並不複雜。如果把斯大林視為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是十分荒謬的，則把他視為一個成功的沙皇便一切順理成章。當然，他和沙皇又有所不同。沙皇所代表的是貴族地主階級的農奴制度，而斯大林所建立的則是前所未有的官僚階級的政治制度。貴族地主階級從名義到法理上都佔有土地和農奴及其產品。斯大林本人及其官僚階級，名義上

並不佔有任何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但實質上他們以全民的名義有權不受限制地、也不受社會監督地使用所有的國家資源。這種權力雖然不能世襲，但這種官僚階級卻能不斷地複製享用這一權力的官僚。有時候也能間接地世襲官僚的權力。如斯大林的二兒子瓦西里，曾官拜空軍中將，最後因酗酒而亡。這種“以全民的名義使用所有的國家資源”的權力由下至上逐級擴大，越到上層越向特權轉化。到最高統治者手裡，則變成絕對權力。斯大林之後的所有蘇聯領袖無一例外均享受到了這種不受社會監督的特權（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之前，也是不受社會監督的。把他趕下臺的是和他一樣的其他政治寡頭。猶如老貴族權臣將沙皇趕下臺一樣）。我們可以將斯大林定義為現代沙皇。和老沙皇所不同的是，他所建立的制度，是適應並服務於自上而下發動的高速工業化和強制農業集體化的官僚制度，而不是服務於中世紀農業社會的貴族官僚制度。新沙皇的經濟基礎就是其官僚機構對國家一切經濟資源的使用和支配權。而這種官僚制度的產生，又正是因為斯大林式的高速工業化和強制農業集體化的前提就是通過高壓的、強迫的乃至殘酷的方式，短期內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不管是老沙皇還是新沙皇，都不需要受到任何監督。其基本原則和宗旨就是個人獨裁或是寡頭領袖的獨裁制。老沙皇和中國皇帝一樣，聲稱其權力為“君權神授”，新沙皇則號稱其權力來自於人民的授予，但授予之後的權力如何使用則無人可以過問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吉倫特黨人羅蘭夫人臨刑前曾留下著名的遺言：“自由，多少罪惡假借你的名字而行！”。兩百多年前的這句話，至今振聳發聵。僅我們這一代人，就看到了多少以人民的名義而實施的罪惡！很多述及到蘇聯解體的文章大都談到：蘇聯解體是因為蘇共領導嚴重地脫離了人民群眾。這句話當然無疑是正確的。問題是斯大林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從根本上就是脫離人民的。一切問題的總根子，就在斯大林所建立的這一政治制度上。後代的蘇聯領導人，

儘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但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制度，使問題越積越多，最後則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筆者無意抹殺斯大林對俄羅斯民族的某些功績，如筆者前面所述，他是一個成功的新沙皇，但說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則似乎是文不對題。

二、對赫魯曉夫改革的評價

衆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開始，我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將赫魯曉夫定性為“現代修正主義者”。而這一稱呼在當時的語境裡幾乎是“反革命”的同義語。

當時認定的赫魯曉夫的具體修正主義罪行有三。一是：全盤否定斯大林；二是：在蘇聯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概念；三是：提出了向帝國主義投降的“三和路線”（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1、首先要澄清的是，赫魯曉夫是否全盤否定過斯大林。任何人恐怕都會承認斯大林犯過很多錯誤。從大肅反開始，直到他的晚年，斯大林時代造成冤假錯案不勝枚舉。這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政治，已經甚至於危及到了黨和國家的所有領導人。所以當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倒下並失去知覺的時候，蘇聯領導人中恐怕無人希望他能夠再重新站起來。同時，新一代政治寡頭們也不希望他們其中的任何一位成為凌駕於中央主席團（即政治局）委員之上的第二個斯大林。恢復起碼的政治秩序，起碼正常的政治生活，在斯大林死後成為全體蘇聯人民，乃至全體最高領袖們的共同訴求。最為簡單的道理則是：不管是平頭百姓還是中央大員，沒有人願意每天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中。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後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上便通過了“實行集體領導”，要求遵守

“列寧制定的黨的準則”的決議。斯大林去世後，莫洛托夫的夫人幾乎立即得到了釋放，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克林姆林宮醫生謀殺案”被撤銷，涉案醫生獲得平反。蘇共中央主席團要求“消除由於破壞蘇聯法律所造成的後果”。這一切，都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了當時整個蘇聯領導集體的共識。1953年6月，貝利亞被捕，同年12月23日，蘇聯最高法院特別審判庭做出判決，貝利亞被判死刑並執行槍決。與貝利亞同時被槍斃的還有其六名親信。“貝利亞小組”成員均被指控犯有叛國罪、組織反蘇維埃小組罪和實施恐怖行動罪。貝利亞本人除這三項罪名外還被指控犯有強姦罪。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再次做出判決，拒絕為原蘇聯秘密警察頭目貝利亞平反，認定1953年蘇聯最高法院對貝利亞的死刑判決為合法。筆者尚未見到有關貝利亞案的原始文件或對該文件的綜述，但懷疑除貝利亞的強姦罪之外，該案也屬於冤假錯案。真正除掉貝利亞的原因還是因為他掌管了不受任何監督而可以製造冤假錯案的蘇聯內務部和安全部等機構。對貝利亞這個人物，人們是心有餘悸的。憑藉這些機構貝利亞曾經，今後也仍舊可以消滅任何一個妨礙他的人，包括中央主席團的委員。雖然最近有一種說法，稱貝利亞是蘇聯改革開放第一人，歷史資料中也確實記錄了貝利亞在斯大林死後試圖緩解斯大林體制某些極端做法的行動。但他已經定格在了蘇聯秘密警察頭子這一恐怖的形象上。“他是一個屠夫，是一個兇手”。⁸ 他的死，雖然並非符合法律程序，卻使蘇共領導人最終解除了安全之憂，也使全蘇聯人民切實感受到了恐怖時代已經過去。

隨著貝利亞之死，以及得到平反而從集中營返回家園的人越來越多，問責冤假錯案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迫於社會壓力，也為

⁸ 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第466頁。

了切實瞭解肅反的規模及其具體內容，在 1955 年 12 月 31 日的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成立了以中央書記波斯佩羅夫為首的委員會，專門負責調查肅反的規模、後果及其責任問題。1956 年 2 月 9 日中央主席團討論了波斯佩羅夫委員會提交的長達 70 頁的報告。中央主席團的大部分委員們（不是全部）對肅反的規模，以及斯大林對其應負主要責任的認定感到震驚和驚訝。隨後，主席團就如何向全黨公佈該調查結果一事，分成了兩派意見。一派以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為代表認為，公佈有關肅反規模的事實，“……我們將要受到責難。黨有權要我們對斯大林領導下發生的事情負責，我們那時也處在領導地位，即使我們不知道那也只是活該——我們仍要為此受到懲罰”。⁹ 赫魯曉夫一派則認為：事實真相是捂不住，也隱瞞不了的，“斯大林作為領袖是站不住腳的，如果他消滅了所有的人，那還叫什麼領袖？”“我的意見是向代表大會作出說明”。中央書記阿里斯托夫提出的問題最為尖銳：“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勇氣說出真相”。但不管是哪一方，對肅反的規模和其責任問題則均無異議。

經過幾番唇槍舌戰，蘇共中央主席團最終還是決定“說出真相”。1956 年 2 月 24 日，蘇共第 20 次代表大會閉幕。當天深夜，赫魯曉夫受中央主席團的委託向大會的代表們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即所謂《秘密報告》，詳細敘述了大肅反的規模、斯大林的責任，並要求肅清個人崇拜在各個領域的影響。蘇共 20 大上的《秘密報告》在國內外產生了鉅大的反響。

需要指出的是，赫魯曉夫不但在其《秘密報告》中，或是在後來的活動中，從來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在《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一再聲明：斯大林是最堅強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對國際工人運動有鉅大的功勞。他的問題只在肅反和衛國戰爭

⁹ 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第 507 頁。

的軍事指揮上，別的方面是還有功勞的。而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源，則由於斯大林性格粗暴，即個性和道德缺陷方面的原因，並不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秘密報告》中也沒有給老一代革命家、列寧的戰友：布哈林、李可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特別是托洛茨基等人平反。赫魯曉夫晚年，在其回憶錄中曾對這一錯誤深感遺憾。

綜上所述，赫魯曉夫平反冤假錯案是當時蘇聯上至蘇共最高領導，下至一般百姓的集體要求。至於公開批判斯大林，則因為斯大林對製造冤假錯案有著無法迴避的責任，無非是拿出了“足夠的勇氣”而“講了實話”，但並沒有對斯大林進行全盤否定。特別是沒有對他所造就的制度進行任何意義上的批判。事實上，赫魯曉夫至死也沒有能夠擺脫斯大林主義的窠臼，從某種意義上講，赫魯曉夫雖然公開批評了斯大林，但在根子上，他卻一直還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只不過他比斯大林開明一些罷了。

2、關於對赫魯曉夫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的評價，問題要複雜得多。總體說來，赫魯曉夫的改革是失敗的，但其中也有不少措施，對緩解當時社會的緊張，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還是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

斯大林死後，新的蘇聯領導集體面對的問題很實際，也很麻煩，有的領域則十分嚴重。表面上，新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內，對蘇聯是一片歌功頌德。蘇聯國內對蘇共中央的新舉措也是一片堅決擁護之聲。但蘇共領導人卻十分清楚當前的局勢。除了亟待平反的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之外，蘇聯的整體經濟狀況也不很樂觀。經歷了慘烈的大肅反以及其後的二戰，人心思定，蘇聯人民也迫切希望能夠過上一種安定平和、衣食無憂的生活。然而，農業——這個與蘇聯人民的生活具有直接關係的部門，則情況頗為嚴峻。在戰爭年代，蘇聯的工農業均受到了鉅大的損失，但其中以農業損失最為嚴重。1946年蘇聯開始實施目的旨在全面恢復蘇聯經濟的第四個五年計劃。該五年計劃規定，1946~1950年間，

農業發展速度要大大超過戰前的幾個五年計劃。糟糕的是，到了1950年，第四個五年計劃的農業發展指標一項也沒有完成。以1950年的糧食產量為例，該年為8500萬噸，而“四五計劃”的年產量則規定為1.27億噸，實際產量僅為計劃的67%。斯大林最後三年的糧食產量平均僅為8100萬噸，甚至低於1950年的產量。以人均產量計算的話，則僅為帝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年，即1913年的81%。其結果是，用於飼料和出口的糧食全面吃緊，引起了食品，特別是肉蛋油的全面供應緊張。糧荒實際上已經對全體蘇聯人民的吃飯問題產生了鉅大的影響。由於蘇聯採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斯大林經濟模式，使得農業長期受到忽視，因而農業問題一直是蘇聯的頑疾。在整個蘇聯時代的70年間，除了列寧時期的數年“新經濟政策”，再就是赫魯曉夫時代尚取得了農產品較為供應充足的局面。赫魯曉夫時代之後，蘇聯很快地再次陷入了農產品短缺、食品匱乏的年代。直至蘇聯解體，農業問題一直沒能走出死胡同。而在斯大林晚年，蘇聯農業幾乎走到了瀕於破產的邊緣。為了逃避過於繁重的稅收，農民開始殺掉牲畜，砍掉果樹，成年勞動力則大量逃離農村。由於糧食收購政策的失誤，即超標徵購糧食，素有蘇聯糧倉之稱的烏克蘭甚至發生了餓殍遍野的饑荒。

工業一直是斯大林的得意之作。在斯大林時代工業一直是以兩位數的百分點在增長。1947年，工業也非常迅速地恢復到了二戰前水平。問題是斯大林的經濟發展理論是以“重輕農”為順序的，這種工業的發展本身就是畸形的。蘇聯人民從這種發展中所得的實惠十分有限。例如，在斯大林時代，新住宅建設幾乎處於停頓狀態。在其晚年，蘇聯住房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更何況，蘇美之間的軍備競賽，早在斯大林時期就開始了。這一最終把蘇聯拖垮了的“軍備競賽”，更是把大量資金投向了軍火工業，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業則更加被忽視。的確，在斯大林的晚年，蘇聯在軍事上是強大的，但人民生活中所能看

得見、摸得著的工業產品卻十分匱乏，且質量低下。這種狀況直到蘇聯解體也沒有得到徹底改觀。筆者曾在蘇聯存在的最後一年，即 1990 年秋訪問過莫斯科，住在當時專門接待外國人的“俄羅斯大飯店”。所見到的電視機令人矚目。在當時連中國都已經普及了彩色電視機的時代，蘇聯的高級飯店裡居然使用的都是黑白電視，且電視機的啟動時間需要將近五分鐘。所有的蘇聯人都會告訴你，啟動這種電視機的時候一定要站遠一點，因為它們經常爆炸。

改造這種畸形的經濟結構，是斯大林之後，特別是赫魯曉夫當政之後所必需面對和解決的問題。1959 年 9 月赫魯曉夫訪美時，曾深感美國商品和物質生活的豐富。為了使蘇聯人民也過上這種好日子，赫魯曉夫確曾設計過幾種解決問題的方案。遺憾的是，赫魯曉夫因其認識水平有限，沒有能夠認識到斯大林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病，即這一體制從根本上就是一個“農輕重”倒掛、比例失調的體制。在這一方面他也一直是斯大林主義的忠實信徒，至死也未能走出斯大林的怪圈，如同他從未真正懂得過列寧主義一樣。有囿於此，赫魯曉夫對蘇聯經濟體制的改革，註定了只能治標不治裡。而這一命題同樣困擾了其後幾代蘇聯領導人，直到蘇聯解體。

赫魯曉夫時代主要的政治經濟改革的舉措如下：

(1) 平反冤假錯案：1956~1957 年，即蘇共 20 大之後，約有 700~800 萬人被從各個集中營釋放回家。另有 500~600 萬人得到了死後平反。所有被釋放人員，特別是 1937~1938 年被捕的人員中，只有 5% 左右當時還尚存於世且年邁體衰，已經難以工作，他們均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戰爭期間被德軍俘虜或被強制送往德國去的軍人，不經平反而全部獲得特赦。這些受害者中，後來有不少人成為了蘇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獲釋人員中有不少人要求追究加害者的法律責任，而解決這一要求顯然是赫魯曉夫所做不到的。受害者中後來有一部分人成為了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的後代或受他們影響的人，後來則形成了積極摧垮蘇聯，導致蘇

聯解體的一股勢力。此外，1955年，隨著蘇聯與西德的關係正常化，幾千名拘押在戰俘營的德國戰俘也被釋放。

(2) 解決農業危機：蘇聯的農業危機首先是糧食危機。20世紀50~60年代曾有過一個通用的公式：四公斤糧食可以產出一公斤肉。所以糧食的短缺，意味著肉蛋油等俄羅斯人傳統的主要食品的全面短缺。赫魯曉夫的方法也很簡單，首先是大規模地開墾處女地。20世紀50年代中期，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東部有四千多萬公頃的處女地、休耕地、乾草地和牧場。1954年3月，在赫魯曉夫的倡議下，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開墾1300萬公頃的荒地。1954年春夏兩季，墾荒的組織工作全面展開。當年墾荒面積就超過計劃，達到了1900萬公頃，1955年又開拓了1400萬公頃的土地。由於主要墾荒區——哈薩克斯坦的氣候多變，1955年的乾旱天氣，使播種的春小麥幾乎全部枯死，解決農業危機的嘗試第一年遭到了失敗。但翌年的1956年，風調雨順，墾荒區獲得了特大豐收，收穫了6300萬噸糧食，使全蘇糧食產量達到了1.25億噸，超過了蘇聯歷史上任何一年的最高水平，也大為緩解了蘇聯的糧荒問題。然而這些成績卻並沒有長期保持下去。由於墾荒本身為倉促上馬，對墾荒區的自然條件沒有做必要的科研，所以新墾地開發後不久，由於植被的破壞，出現了風沙侵蝕沃土的生態災難。從1955~1960年，有幾十萬公頃土地被風沙捲走。1963年春天的幾場暴風又將上百萬公頃的土壤捲起，颳到了一百多公里之外。墾荒區的糧食產量極其不穩定的問題終於在1963年爆發出來。這一年由於墾荒區全面歉收，赫魯曉夫不得不動用860萬噸的黃金儲備從國外進口糧食，從此開始了泱泱農業大國的蘇聯每年從國外進口糧食的歷史。儘管如此，總的說來直到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下臺，蘇聯全國範圍內農產品及食品的總體供應還是充足的，也是蘇聯歷史上人民生活最為豐裕的時代。特別是與同時遭受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相比，則別如天壤。

為瞭解決農業問題，赫魯曉夫還採取了很多其他措施，如擔任第一書記後，大幅度消減了自留地的物產稅和取消了對個人所有的果樹、奶牛的實物稅，以及政府以相當高的價格購買農民的剩餘產品，鼓勵餵養奶牛、雞、鴨、豬，種植小片菜地果園，允許工人和機關幹部開拓集體園地，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一筆勾銷了集體農莊拖欠的老賬等。這些措施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此處不再贅述。

到 1959 年蘇聯每個農戶家庭年收入已達到六百美元，與 1953 年平均 150 美元的水平相比翻了兩番。總的來說，在赫魯曉夫的努力下，蘇聯終於避免了一場農業危機。

（3）解決住房問題。斯大林去世後不久召開的一次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莫洛托夫就提出：“在莫斯科對住房情況有很大的不滿”。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也提到：“人民住在擁擠不堪，寄生蟲蔓延等不可容忍的條件中，以及常常兩家合住一間房”¹⁰的現狀。在赫魯曉夫的主持下，1956~1965 年的十年間共建築了 9.6 億平方米的住宅。當然，為了加速建設，赫魯曉夫下令使用統一的圖紙，造成房子千篇一律。為了節省經費，降低了某些規格，為了不使用昂貴的電梯，樓房被限制為 4~5 層，外觀上也沒做任何裝飾，很快就得到了“赫魯曉夫貧民窟”的綽號。但畢竟城市的房荒得到了很大的緩解。

（4）關於利潤掛帥的討論。1962 年 9 月 9 日，哈爾科夫工程經濟學院教授利別爾曼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計劃、利潤、獎金〉的文章。這篇文章提出了新的企業改革方案——經濟核算的計劃管理體系，並把利潤率與獎金掛鉤，作為刺激新計劃體系運行的動力。這篇文章引起了廣泛而激烈的爭論。利別爾曼的改革思路是改革計劃管理，以及制定計劃的方法。

¹⁰ 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東方出版社 1988 年，第 170 頁。

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是高度集中的，企業毫無自主權。利別爾曼要求改變這種模式並向企業放權。即，中央計劃部門只下達：產量計劃、交貨期計劃以及贏利定額。企業按這三項計劃要求，再制定出全面的生產計劃，包括勞動生產率、工作人員數、工資、產品成本、積累、投資和新技術等。中央計劃部門只管大事，至於企業如何完成這些計劃是企業自己的事，中央計劃部門不必過問。利別爾曼認為：管理部門必須向企業放權。

利別爾曼的建議是對斯大林式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嘗試。他企圖在保留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引進一些市場經濟的手段，作為經濟槓桿對計劃經濟進行調節。特別是他提出的考核企業的主要經濟指標——“利潤”之議，引來了激烈的辯論。反對者稱，利別爾曼想要顛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

隨著1964年10月赫魯曉夫的下臺，有關利別爾曼改革方案的討論也就偃旗息鼓了。“利潤”最終也沒能成為蘇聯企業的考核指標。

當然，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利潤掛帥”本身也是行不通的。按照斯大林的說法，蘇聯經濟中的價格，只是一種形式，目的只在於用它進行核算和統計，並不反映實際的供求關係。因此有些價格十年、20年不變，有些時候甚至低於成本。在這樣一種計劃經濟的價格體系中，要想合理安排成本、工資、勞動生產率等，並以所獲利潤率來考核企業的經營水平，本身就是就缺乏可操作性。正如後來我國學者所指出的：利別爾曼的建議，只打算改變蘇聯經濟的指標體系，並未觸動蘇聯的經濟制度，更沒有指出蘇聯經濟需要進行結構性的改革。

(5)成立國民經濟委員會和劃分工業黨、農業黨。1959年秋，赫魯曉夫訪美。美國工農業的高度發展，讓赫魯曉夫眼花繚亂，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一個美國農場主兼朋友的介紹中，赫魯曉夫瞭解到，在美國，政府部門並不直接介入企業和農場的生產活動，既不能下命令也不能派指標，而只能利用政策和法規

對經濟進行宏觀指導，企業和農場都擁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這種直接面向消費者的生產方式對赫魯曉夫的觸動很大。為了能夠將這種靈活的生產機制運用到蘇聯經濟之中，而又不完全背離被視之為社會主義經典的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原則，赫魯曉夫提出，在國防和其他關鍵性的重工業部門繼續實行中央控制的同時，對所有其他生產部門，特別是消費品生產部門，取消以莫斯科為中心的部委控制。將企業的管理權下放到新成立各州的國民經濟委員會。目的是“使管理與生產聯繫得更為緊密，減少官僚主義，並鼓勵地方的積極性與競爭”。1957年5月，這項改革措施由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成為法令。下放管理權，減少管理環節，改變金字塔式的僵化的管理體制，使生產活動更能反映實際的社會需求，這些想法當然都是可貴的。不幸的是，在蘇聯這個具體的經濟環境中，這項改革非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使得經濟關係變得混亂和無序。

首先，下放的權力並沒有交給企業，而是交給了較之中央部委低兩級的“州國民經濟委員會”，其實質是一個統一的中央權力被解體為一個州一個州的次級權力。企業則仍然沒有自主權。其次，在蘇聯由於長期實行計劃經濟，企業的生產活動一直由中央主管部門協調。一個產品的生產過程，往往需要進行跨地區，甚至是跨部門的協作。而這種協調工作傳統上一直由中央一級或共和國一級的主管部門進行統一指揮調度。改革之前，企業的主管人員只需要向一個上級機構負責，隸屬關係改變之後，則不得不與從屬於十幾個不同的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企業打交道。無政府主義開始在企業之中蔓延。

面對這些改革帶來的問題，赫魯曉夫沒有繼續顯示出勇氣，把經營自主權直接交給企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開始收回已將下放了權力。措施之一是將幾個州級國民經濟委員會合併為跨州的大型國民經濟委員會。然後，又在跨州的大型國民經濟委員

會之上，成立了共和國一級的“中心委員會”，其後又成立了全蘇的“最高經濟委員會”。到1963年，非但沒能精簡官僚機構，形成美國式的競爭局面，反而管理機構擴大了三倍。造成了機構重疊、平行，責任分散等惡果。同時倉庫裡卻堆滿了根本賣不出去的產品。在赫魯曉夫下臺後，國民經濟委員會終於被撤銷。

劃分工業黨和農業黨則是壓垮赫魯曉夫的最後一根稻草。1962年11月的中央全會上通過了將所有州一級的黨委會分成負責工業和負責農業的兩個彼此獨立的委員會。在蘇共中央一級相應地也成立了中央工業局和中央農業局。在州委一級，第一書記負責工業，卻管不了負責農業的第二書記。負責農業的第二書記也無需向第一書記彙報工作。整個蘇共，進而整個蘇聯分成了互不從屬的工業黨和農業黨。行政管轄權的混亂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如，警察局長應該向哪位書記彙報，思想工作、公共衛生、教育等領域由哪位書記負責。這種改革的草率作風，讓官僚們感到了缺乏安全感和動盪不安，最終激怒了整個官僚階級，使赫魯曉夫最後徹底喪失了威信。他的下臺只是時間問題了。

(6) 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概念。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了22大。會上提出了蘇共是“全民黨”，蘇聯是“全民國家”的新理論。中共中央對這一理論的評價是：“全民國家、全民黨理論的提出，無疑是公開打出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蘇共已面臨著從無產階級政黨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政黨”。¹¹

從十月革命算起到蘇共22大，蘇聯已走過了44年的歷程。官僚階級早已站穩了腳跟，成為了一個主宰蘇聯的統治階級。44年來，除一些個人的消費資料外（房子、汽車、傢俱、現鈔等），所有資產都已歸為國有。地主、富農、資本家早已不是從肉體上被消滅，就是逃亡國外。到了赫魯曉夫，蘇聯已經進入了第三代

¹¹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第302頁。

領導人的時代，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的，則是蘇聯的第四代人。儘管官僚階級是統治階級，但從法理上他們被稱之為“幹部”，也屬於勞動者的一部分。從理論上說，蘇聯已經不存在剝削階級，社會的各階層的成員都被稱之為“社會主義勞動者”。蘇聯政府頒發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勳章的受獎人中，既包括了工人，也包括了集體農莊的莊員，軍人、知識分子、文化界人士，以及各級領導幹部。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法理上都不佔有私人資產的情況下，蘇聯各階層的成員，理論上也就同屬於無產階級，並共同融入了“社會主義勞動者”這一稱號之中。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再去解釋只有工人一個階級是無產階級，或是最先進的階級，已難自圓其說。進而言之，則蘇聯共產黨所能代表的也只有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了。既然理論上已經不存在剝削、壓迫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對立階級，無產階級專政也同時失去了專政的階級對象，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也就順理成章了。在這樣的理論遊戲之中，主宰蘇聯的官僚階級給自己找到了一個最舒服的位置，即：代表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先進分子。於是，官僚們的蘇共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代表全民利益的“全民黨”，而蘇聯則相應成為了“全民國家”。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時候，中國的情況則是完全不同的。當時中國共產黨剛剛接管政權，舊有的經濟關係還沒有被徹底改變。資產階級還在，雖然在公私合營之後已經失去了對資本的支配權，但仍然還能領到金額可觀的“定息”。中世紀式的農民還是中國的主體。雖然工人階級從世紀之初已經開始出現，但只有在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即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開始之後，工人才真正作為一個強大的階級，在社會上真正嶄露頭角，成為了社會的中堅。工農差距還是鉅大的，且工人階級當時也確實代表了一種新興的力量。而幹部雖然掌握著鉅大的權力，但尚未蛻變成官僚階級，還屬於勞動人民中的一員。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資本家、地主雖然已經被剝奪，但正如毛

主席所說：“人還在，心不死”。所以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還很難理解蘇聯所發生的社會變化。當時中國對蘇聯領導人“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篡改列寧的國家學說”等指責，就是因為不理解蘇聯國內的舊有經濟關係，以及階級關係已經大為改變。蘇聯在經過慘烈的“階級鬥爭”時代之後，人們不願再和那些早已不存在的階級繼續進行“階級鬥爭”，更為現實的希望則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能夠走向一種共贏的關係，即，對一個相對非對抗性的社會、和諧的社會、強權相對平和的社會的期望。

實際上任何一個經濟水平進入小康時代的國家都會面臨和蘇聯同樣的問題。當階級界限越來越模糊，大部分人逐漸進入中產，階級關係出現了非對抗性的特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時代來臨之後，如何界定政黨的政治訴求，就會成為一個問題。英國工黨與保守黨，日本社會黨和自民黨，雖然各有各的路線綱領，對社會某些階層的利益會有一些傾斜，但這些區別應該說都僅限於操作層面上的具體問題。從總體上各階級利益的基本平衡是不能打破的，但一個個政黨也不得不越來越多地顧及到遊離於各個政黨之間的廣大中間群體的利益。以一個階級打倒一個階級，“專政”一個階級的時代正在退出歷史。認可階級差異，建立各階級間的共存關係，正成為主流。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也遇到了同樣的，即我們還需不需要“專政誰”的問題？“三個代表”的理論不也正是這一同樣歷史進程的產物嗎。

3、國際關係上的“三和路線”（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美，被美國的社會繁榮所震撼，開始了短暫的“蘇美蜜月”時期。1961年10月召開的22大上，赫魯曉夫將20大以來逐步形成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即所謂“三和路線”更加系統化，形成了的對外關係新綱領。中國政府對此反應是“修正主義形成完整體系的里程碑”。進而對

“古巴導彈危機”和“中印邊界反擊戰”中赫魯曉夫的表現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將“三和路線”稱之為“向帝國主義投降”的路線。以至於最終將肯尼迪，尼赫魯和尼基塔·赫魯曉夫並稱為一丘之貉的“三尼”（趙朴初“某公三哭”）。

要理清其中的的是是非非，首先還是要弄清兩國不同的國情和立場。

就蘇聯來說，首先是：剛剛經歷過的蘇德戰爭還記憶猶新。蘇聯幾乎每個家庭都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反戰情緒是蘇聯人民的集體情結。戰後出現的電影“雁南飛”和“一個人的遭遇”都是這種反戰情緒的反映。不管是為了什麼主義，總之仗是不能再打了。要求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進而希望裁軍、緩解國際緊張局勢是蘇聯人民的共同願望。

其次是，斯大林高速工業化和戰爭時期的高強度勞動，斯大林肅反和戰爭的苦難，使蘇聯人民感受了太多的痛苦和悲歡離合。當國家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之後，人民希望過上一種正常的生活，多享受一些經濟成果，並以此彌補一些因過去的苦難而損失的時光。人們普遍認為，終於等到了一個能夠充分享受生活的和平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生活遠遠高於蘇聯，因而蘇聯人民也希望，並在當時也確信他們有能力在現有的制度下，通過發展科學技術的新手段，迅速趕上並過上與西方國家同樣的富裕生活。

再其次，蘇聯共產黨早已經不是一個革命政黨。列寧的教導和理想早已經是遙遠的空穀回聲。斯大林、赫魯曉夫及其之後的領導人，也早已經不再關心那些“支援被壓迫民族”，“解放仍在受苦受難人民”的所謂“國際主義義務”。從斯大林時代起，“共產主義”、“國際主義”這些美麗的詞彙都是用來為現實的目的，也就是蘇聯國家利益服務的。斯大林時代，打著“國際主義”的旗號進行的“蘇芬戰爭”，“蘇德瓜分波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都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行徑。戰後蘇聯對東歐社

會主義國家的控制，經互會，有限主權論，阿富汗入侵，干涉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和中東事務，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問題，也都是基於蘇聯國家利益的行動。無怪乎毛澤東主席後來將蘇聯稱之為“社會帝國主義”。所不同的是，這種社會帝國主義的行徑，不是始於赫魯曉夫，而是植根於其師傅斯大林，或更遠的沙皇俄國擴張主義的傳統。在當時的情況下，對蘇聯的國家利益來說，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緩和緊張局勢，避免戰爭的爆發，進而維持友好關係，進行某些領域內的技術合作（如太空領域的合作），比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支援沒有回報的窮兄弟要合算，也要安全得多。除了列寧時代之外，蘇聯的國際主義支援，大都是有其國家利益的原因。

“三和主義”的目的完全是國家主義的，其宗旨就是想向西方國家示好，表示願意當朋友而不是當敵人，創建一個和平的國際空間。聲明不再支持以暴力手段顛覆各國政府的行為。可能的話，還希望和西方國家進行技術合作，取長補短，提高自己的國力，達到與發達國家同樣的水平。1959年，赫魯曉夫在美國產品展覽會的廚房展示間，對著當時的副總統尼克松揮舞著拳頭說：“我們將消滅你們”，是為著名的“廚房辯論”。其意思並不是真要“消滅美國”，而是說，我們蘇聯人在經濟競賽中不會輸給你們。有點像我國後來提出的“和平崛起”的說法。

就新中國來說，則情況完全不同。首先，中國黨剛剛完成了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雖然都很慘烈，但中國卻因此贏得了一個全新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國家是一個窮國，百廢待興。為了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洗刷百年的屈辱，人們準備隨時赴湯蹈火，去完成一個偉大的歷史使命。那時的中國人，一窮二白，不怕犧牲，也沒有害怕失去的家當，更沒人打算坐享其成地開始享受生活。

其次，50年代的中國黨，剛走出革命戰爭不久，還沒有脫掉理想主義外衣，還是一個革命政黨。一個革命政黨所考慮的就不只

是自己的利益，革命理想也還佔有重要的分量。建國後 20 多年的時間裡，中國政府不顧自己的困難，也確實對很多弱小的國家進行了不計回報的無私援助。當然也就贏得了當時稱之為“亞非拉”窮哥們兒的尊敬。中國政府當時確實是打算通過世界革命來改變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因為中國當時也還是這一秩序的受害者，而蘇聯則相反，是參與構建了這個體系，已經是它的受益者。對中國人來說“國際主義”是的是的確確的“義務”，而不是什麼騙人的把戲。

道不同，不與為謀。中蘇兩國，一個為了本國利益，一個為了世界革命，出發點不同，當然也就難以形成共識，並同舟共濟了。

總的說來，赫魯曉夫時代的改革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也是當時全體蘇聯人民的共同訴求。在這一改革中，赫魯曉夫的很多草率決定，帶來了很多災難性的後果，但也有不少改革措施，給當時的蘇聯人民帶來了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物質上的實惠。但從根本上說，赫魯曉夫的政治經濟改革是失敗的。他從未全盤否定過斯大林，更沒有全盤否定也未從根本上觸動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制度。他所進行的改革僅限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水平。充其量也就只能稱之為“變革”。他連不改變計劃經濟的前提下，實現經濟核算和利潤掛帥的建議都沒有敢於採納，使之僅僅停留在口水戰的討論階段。說他在蘇聯復辟了資本主義，更是無從談起。正如某些評論所稱：“赫魯曉夫反對的是斯大林，而非斯大林主義”。和中國毅然決然地實行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相比，赫魯曉夫改革就其深度和廣度，乃至魄力均不可同日而語。

赫魯曉夫是被官僚集團趕下臺的。在我國，長期以來將這一集團稱之為“新興資產階級”。這是一個新興階級，但決不是資產階級。因此也與資本主義復辟沒有邏輯聯繫。筆者在上文中將這一新興階級稱為“官僚階級”。赫魯曉夫的所有做法首先維護的是這一階級的根本利益。官僚階級的特點是非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是不願進行任何改革的。而當時蘇聯的情況已經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

當改革既符合官僚的利益，也符合全民利益的時候，改革是受到歡迎的。當改革影響到了官僚們的舒適的日常生活，他們便毫不猶豫地將赫魯曉夫趕下了臺。赫魯曉夫當然也是這一官僚階級的一員，所以他的改革中當然從來沒有過向列寧主義靠近的試圖。即便是赫魯曉夫想有，也不會被官僚集團所允許。囿於他個人水平和魄力所限，他也未能將改革引向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現代化。赫魯曉夫並沒有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他所做的是固化了斯大林所建立的官僚階級的統治制度。理順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關係，成功地避免了統治和被統治階級間的矛盾發展成對抗性矛盾。或曰，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國家政權調節各階級和階層既得利益的功能。赫魯曉夫之後，一切改革都停在了半路，開始了長達 18 年的停滯時期。官僚們滿足於安定、平庸而自鳴得意的生活。國家政權的社會調節功能日益頹廢，政治、體制、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越積越多。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時候，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

筆者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成功，其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黨在改革開放之初，尚未蛻變成蘇聯式的官僚階級政黨，至少還保留了一定的革命傳統。例如，1978 年當萬里在安徽同意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時，並不存在他個人的既得利益問題，有的只是政治風險。